

松江府在明代的经济地位

——兼论上海地区的近代化转型

朱子彦

(上海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444)

【摘要】松江府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是举世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即以其富庶傲视全国,其中,松江府更是占据了突出地位。明代中叶是松江府(上海县为松江府所管辖)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明代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遏制了这一发展趋势。甲申之变后,清兵大举南下,松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三屠以及松江、江阴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扼杀了。

【关键词】松江府;明代;经济地位

【中图分类号】K 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2)03-0052-10

一、松江之富甲天下

松江府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是举世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即以其富庶傲视全国。苏、松、杭、嘉、湖五府,是江南的繁华中心。其中,松江府更是占据了突出地位。明代中叶是松江府(上海县为松江府所管辖)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破土而出,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透过中世纪的漫长黑夜,人们仿佛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王鏊在其弘治《上海县志》序中写道:“松江一郡耳,岁赋京师至八十万,其在上海者十六万有奇。重以土产之饶,海错之异,木绵、文绦、衣被天下,可谓富矣。”赞叹之余,不无自豪之感。松江府的繁荣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在封建时代,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主要是看这个地区在维持人类生活的两大要素——衣、食方面,能向社会提供多少。正是在这两个关键的农业生产部门,即粮食和棉花的生产方面,明代松江府在全国名列前茅。

明代松江府是全国闻名的产米区。农业生产技术已有很大进步,生产工具的创新,谷物品种的改良,水利兴修,农田管理,都达到一个新水平。松江农民对种子的培育和推广,是极为重视的。松江的白粳、薄稻历来脍炙人口,每年贡献朝廷、皇室,不可一日或缺。据志书所载,谷物品种就有五十余种之多,其中播种期最短的有六十日稻,三月种,五月熟。质量最佳的如箭子稻,粒长而细,色白味甘。糯稻品种繁多,都是酿酒上品。早在唐朝刘梦得诗中,就有“酒法得传吴米好”之句。

松江地区既是水乡,又多旱地。因地制宜,豆类作物的种植也不少。松江土地利用率之高,不但在全国,即使在江南也是

【收稿日期】2012-02-10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的资助。

【作者简介】朱子彦(1948-),男,上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明史的研究。

少有的。诸葛昇《垦田十议》曰：“江南园地最贵，民间蒔葱薤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舍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藪共争，谁能余隙地。”^①

江南劳动人民几乎把每寸土地，都充分利用起来，用以创造财富。松江更是其中的典型。在有限的土地上，松江农民生产出了大批粮食。根据李伯重的估算，明末江南地区的水稻亩产大约为1.6石。松江府亩产多少呢？按照何良俊的记载，明代嘉靖年间，松江府的水稻产区（主要在西乡）的亩产量一般是2.5石^{〔1〕}，松江东乡丰年亩产1.5石。根据耕地的分布状况，平均下来，亩产约在2石左右。明代弘治年间，松江府垦田约有470余万亩。这样松江府全年的水稻产量约有900多万石，这还不包括春花作物的产量，所谓春花乃是指小麦与油菜、豆类等作物。松江小麦产量也是不低的，而且在粮食作物中占的比重也不小。何良俊说：松江东乡地区“农夫终岁勤动，还租之后，不够二三月饭米，即望来岁麦熟，以为种田资本，至夏中只吃粗麦粥。”^{〔1〕}

可见小麦的重要性。清初张履祥在《补农书》中也指出：“吾乡春花之利居半。”江南的粮食消费水准大约为每人每年食米3石左右，根据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松江府的人口数为1219937人，除去农民上交给官府的田赋之外，人均有米4.5石以上。这样看来，松江府即使不发展棉纺织业，粮食亦能够自给。更值得称道的是棉花的种植。松江棉花种植业始盛于元代。早在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就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②

洪武元年（1368年）又把此令推广到各地。松江植棉业，洪武初年在全国各府州中已首屈一指，明中叶又得到进一步推广，归有光言：“窃维三区虽逮本县，而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专事纺织。周文襄公巡抚之时，为通融之法，令此三区出官布若干匹，每匹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纳税粮，官无科扰，民获休息。至弘治之末，号称殷富。”^③

隆庆、万历后，为了适应城市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棉花种植的比重越来越高。松江棉花种植面积，据徐光启说：“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④这个垦田数字当指上海一县言，松江府垦田在明初达五百余万亩。

棉花和水稻的生长对地势高低以及土壤的结构要求不同，棉花主要种植在只适于种植棉花而不适于种植水稻的耕地上。那么明清时期松江到底有多少只适于种植棉花而不适于种植水稻的田地呢？何泉达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从土壤等自然条件入手，计算出明代后期，松江地区只适于种植棉花的耕地面积约为140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2.5%。^{〔2〕}

不过，适于种植棉花的耕地未必全部种上了棉花。范金民根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卷三十五《农桑广类·木棉》中的记载，估计明末松江府实际种植棉花大约为70万亩。^{〔3〕}

①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8，《开垦》。

② 《明太祖实录》卷15。

③ 《论三区赋役水利书》，《震川先生全集》卷8。

④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木棉》。

⑤ 《古今图书集成》卷696，《松江府风俗考》。

⑥ 《明太祖实录》卷56。

⑦ 《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篇，布衣。

⑧ 《广群芳谱》卷12。

⑨ 《古今图书集成》卷696，《松江府风俗考》。

当然要精确判断松江府到底有多少土地种植棉花颇为不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松江府的棉花市场极为繁荣，已成为全国广为流通的重要商品。松江府的发展和繁荣，还表现为农业与手工业的密切结合。当时，松江府几乎家家都纺纱织布，使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松江府城棉纺织业兴旺发达，“至于乡村，纺织尤尚精致，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⑤

要想精确统计明代松江府每年生产多少布匹是困难的。“洪武三年户部奏赏军用布匹甚多，请于浙西四府秋粮内收布三十万匹，太祖曰：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余征米如故。”^⑥这条记载，从一个侧面说明松江府产布之盛。据严中平推算，明代“全国所谓‘上供’、‘公用’两项消费，每年所需棉布恐不下六七百万匹”。

[4] 松江地区是棉布的主要供给区，为数可达数百万匹。至于民间买卖的布匹，也不会少于此数。有人估计，松江府年约产销棉花几千万匹。[5] 这个估计似乎偏高，但松江棉布生产数量之多、对全国贡献之大，是毋庸置疑的。明代松江的棉花，产品精美，品种繁多，花样新颖，冠于全国，驰名中外。宋应星谓：“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松江。”^⑦

松江生产许多各具特色的高级棉布，如三梭布、贡品布、尤墩布、丁娘子布等，多销京师，为皇室、贵族所用。王象晋盛赞“其布之丽密，他方莫及焉”。^⑧反映出松江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松郡所出，皆切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⑨明代松江棉布，无论从实用言，从技术精湛言，都超过苏杭，在全国居第一位。

松江府农业、棉纺织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必然带来商品经济的繁荣。全国各地前往松江府收购棉花、棉纱、棉织品（包括棉布、鞋袜、头巾、被服等）的商人云集。松江和上海所属的枫泾镇、朱泾镇、罗店镇、朱家角镇等，都是棉布业的中心和棉花的集散地。在松江府城和周围的这些乡镇，聚集着众多的牙行和商贾。他们不仅坐庄收布，而且对棉布进行种种加工。明末在枫泾、朱泾镇曾出现数百家布号。诗人吴伟业在目睹明代松江地区棉花市场的盛况时，感慨道：“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①

松江府的棉花，南销浙西与闽、广。“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②对闽广的销售量也很大，松江棉纺织品不仅名闻全国，而且远销国外，“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③松江棉纺织业为松江人民创造了巨大财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④“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⑤此外，松江的丝织品也有一定的名声。松江府城产绫，制作极精，上海顾氏露香园的顾绣，更是名噪远近。

松江近郊的农户，不仅把织布作为自己的专业生产，并且还出现了从事棉花加工的轧花、弹花，以及经营棉制品的制袜等专门行业。以夏袜为例，在松江城西郊，单袜店就有百余家。“松江旧无暑袜店。……万历以来，以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⑥

这些袜店店主，采取统一分发原料，使小生产者自己加工，这样一来，袜店店主实际上成了没有厂房的资本家，那些为袜店加工生产，“从店中给筹取值”的“合郡男妇”，则成为店主控制下的雇佣工人。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踹坊，染坊。这说明棉布业专业化生产的程度已相当高。

①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10，《木棉吟》。

② 叶梦珠：《阅世篇》，《食货志四》。

③ 姚叔祥：《见只篇》卷上。

④ 叶梦珠：《阅世编》卷7。

⑤ 万历《嘉定县志》卷6，《物产》。

⑥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

⑦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卷5。

⑧ 顾清：《松江府志》卷8，《田赋》下。

据崇祯《松江府志》记载，明中叶松江城尚较荒凉，城内触目所见，绝大多数都是草房，菜地。到嘉靖以后，松江城内建造了许多华丽的住宅和众多的店铺。城西郊有上百家暑袜店，松江原无细木器店，隆万后，“徽州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郡中原无黄草蒲鞋店，万历以来，城东开了许多鞋店，“宜兴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有的人从事踹染而致富，“尝闻吾郡东乡陈氏染练，颇擅其利，饶裕有利”。松江林某，“以卖生药起家，至今人呼之为林生药”。⑦

通过时人的记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松江府城，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除粮食、棉花和棉纺织品外，松江的盐业也堪称发达。沿海煮盐，松江设下沙等五场，额办盐128,365引，每引一百九十斤，课钞385,095锭。顾清说“昔至元盐荚之榷于两浙也，以引计凡四万耳。后浸益至四十八万，而松江之额十万有奇，民其得无瘵乎”。⑧

外，渔业生产也有长足之发展，捕鱼工具和办法很多。总之，综合粮、棉、布、盐、渔各业，明代松江府所创造的巨大财富，除苏州府可相提并论外，全国其他各府州皆望尘莫及。

二、松江民众的沉重负担

松江府经济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松江民众创造的社会财富之多和赋税力役之重，在明代各府州中也数一数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松重赋问题。朱元璋最初以应天府为根据地，与陈友谅、张士诚为敌，处境并不好，朱元璋一生事业的转机是在消灭陈友谅，平定张士诚之后。这时，繁华的江南八府一州，特别是苏松地区，已取代金陵，成为朱元璋财政赋税的主要来源。朱元璋曾自比刘邦，是有道理的。如果说，刘邦在楚汉相争时以富庶的关中作为后方，使其最后战胜项羽有了物质保证。而布衣起家的朱元璋则依靠繁华富庶的江南新区，逐一兼并群雄，并最终推翻元王朝。

有明一代，苏、松两府是明王朝取之不竭的国库。顾炎武《日知录》引丘濬《大学衍义补》：“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西又居江南之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之十九也。”顾炎武又指出，“苏、松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同书还引王上舍的话说：“今之赋税较宋浮至七倍，比元也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广省额征二百三万，而苏州一府之数浮之，福建省额征一百万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数浮之。岂天下之田皆生粟，而二郡独雨金欤？”据《诸司职掌》及《万历会典》载：松江府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所交税粮，在十八个直属府州中，仅次于苏州而居第二位。以松江一府与全国十三省相比，低于山西、浙江、江西、山东、湖广、河南、陕西七个行省，而高于北平及四川、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六个行省，需要说明的是：明初苏州一府七县，松江府仅两县。从每县平均负担数看，苏州每县负担四十万石，松江则高达六十四万石，比苏州还要高。

苏、松重赋，在明代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时人评论很多。杜宗桓在其《上巡抚周公书》中对苏、松重赋问题作了历史的回顾，指出：“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①为什么历朝皇帝都明知苏、松田赋最重，却不能也不愿给予减轻？除宋元以来历史上造成的既成事实外，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封建国家军政及内庭费用甚大，全国其他地区经济不发达，灾荒相继，因此只能把重担压在经济上尚有潜力的苏、松地区。

① 嘉靖《上海县志》卷8。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14，《开国规模》。

③ 黄庭鹄：《役法原疏》，载《明经世文编》卷503。

④ 《万历会典》卷27，户部会计漕运。

⑤ 赵用贤：《江南粮役疏》，载《明经世文编》卷397。

⑥ 张栋：《国计民生交细疏》，载《明经世文编》卷438。

⑦ 邵吉甫：《苏松田赋考》卷上，抄本。

⑧ 邵吉甫：《苏松田赋考》卷上，抄本。

⑨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6编资料计算。

松江地区力役之重，也是骇人听闻的。明代力役一开始就不轻。在建国初期，除军旅外，劳民最突出的是南京、凤阳两地的营建。南京都城营建始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洪武二年（1369年），又以临濠为中都，工程延续六年。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又下诏兴建公侯第宅于中都，计六公、二十七侯，而陵墓的建设工程也不小。朱棣营建北京，工程更繁，诸色工匠多数来自江南，建都工作进行了十几年。明中叶以后与苏松直接有关的，如武宗的南巡，嘉靖的平倭，万历的矿税，力役愈来愈重，“以致征伐之功无虚日，土木之工无已时”。②

何良俊说：“江南自有倭夷之变，用兵六七年，中更总督数人，所费钱粮数百万。”[1]经过倭寇之乱，江南元气大损，他不胜感慨地说：“今则萧索之甚，较之苏州，盖十不逮一矣。”[6]除规定的国家正役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差役。黄廷鹄认为，赋税虽重，尚能忍受，“独是役差一端，备极繁重，……此他郡未必具有，而松郡独兼有之者也”。③田赋力役之外，还有“加耗”。洪武时，松江人民交纳税粮多就近或京师，水运方便，运输耗损有限。永乐迁都后，漕粮由江南长途北运，南粮北调，逐年增加。据《明会典》载，松江每年漕米二十三万二千九百五十石，加耗损十五万三千七百四十七石，④合计三十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七石。这只是官方公开承认的“加耗”数。赵用贤对江南名目繁多的加耗算过一笔细账，结论是：“通正米为四石余始当白粮一石，则此二十余万实为八十万矣。此天下所无，而江南之所有，民几何而能胜也。”⑤张栋的奏疏也谓，江南加耗“朝廷所得不过正米一石，而小民所费几及数石矣”。⑥这是多么可怕的额外负担！明中叶后，除“加耗”外又有“加派”，即追加田赋。“松郡加赋始于嘉靖甲寅倭乱。万历中东征关白，又每亩加编，事平之后独以沿海地方征敛如故。末年踵而行之，边饷复增至九厘一亩，民困已极”。⑦万历后期，全国按田亩增辽饷，崇祯以后，辽饷之外，又加剿饷。虽属全国普遍追加，然“不思江南正赋向已十倍江北，其余杂供耗费又且数倍不止矣”。⑧

为了说明问题，还可将松江和全国其他地区农民的负担情况再作一对比。据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松江府垦田五百一十三万亩，应征税粮一百二十一万零石，平均每亩征23.77升，仅次于苏州而居全国第二位。是年全国垦田八万五千余万亩，应征税粮米麦二千九百余万石，平均每亩征收3.46升，相当于松江的七分之一。北方府州平均每亩征2.01升，相当于松江的十二分之一。②

弘治十五年（1502年），全国垦田六万二千二百余万亩，应征税粮二千六百余万石，平均每亩征4.30升。松江府垦田四百七十余万亩，应征税一百零三万余石，平均每亩征21.78升。而苏州府已从洪武初年平均每亩负担28升降为13升，下降了一半还多，故此以后松江平均每亩征收数，在全国已跃居第一位。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垦田七万一百余万亩，应征收税租二千六百六十三万余石，平均每亩征3.80升。松江府垦田四百二十四万七千余亩，应征粮一百零三万一千余石，每亩平均24.29升，而北直隶每府州的平均数，只相当于松江府的二十三分之一。③松江府人民负担之重，还可从其他侧面加以考察。如从松江府上交的夏、秋两税和垦田数在全国的比重看，有如下表

年份	垦田占全国百分比	夏秋税粮占全国百分比
洪武二十六年	0.60%	6.50%
弘治九年	0.76%	6.23%
万历六年	0.61%	6.24%

这说明，垦田和交税的比重相差十倍。再从松江府每户平均负担的赋税看，从明初到中后期在不断增长，见下表：

① 表的资料来源：《万历明会典》卷17，《户部四·田土》；嘉庆《松江府志》卷28，《田赋志·户口》；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② 《王周二公疏》卷1，载《明经世文编》卷22。

③ 顾清：《松江府志》卷5，《土产》。

年份	户	口	田亩
洪武二十六年	249,950	1,219,937	5,132,290
弘治四年	200,520	627,313	4,715,662
万历六年	218,359	484,414	4,247,703

年份	征收米麦	平均 每户负担	平均 每人负担
洪武二十六年	1,219,896 石	4.9 石	约 1 石
弘治十五年	1,031,485 石	约 5.1 石	约 1.6 石
万历六年	1,031,486 石	约 4.9 石	约 2.1 石

综合以上两表，①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洪武、弘治到万历，松江府官方人口统计数减少了一半还多（实际人口并未减少），而税收减少有限。结果税收负担全部加到留下来的，不到一半的人身上。使人均税收负担，从洪武时的平均一石，增加到弘治时的一点六石，万历时的二点一石，即增加了一倍。这是就米、麦主粮而言。夏税秋粮中还有豆类、丝、绵、绢、布、纱及其他杂项，少算也可增加一倍。再加损耗，漕运负担增派，官吏、差役、粮长、里甲敲诈勒索及高利贷等，至少增加一倍。这样就要增加三四倍。难怪周忱说：“天下民固劳矣，而苏、松之民比于天下，其劳又加倍焉；天下之民固贫矣，而苏松之民比天下，其贫又加焉。”②由此可见，松江民众对当时社会的贡献之大，以及明王朝对这一地区百姓的征赋之重，都是十分突出的。

三、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明代松江府的繁荣、富庶是怎样造成的？顾清回答是：“松壤地不多而物产有名天下者，力耕植勤纺织也。”③

农民的力耕勤织，无疑是封建时代源源不绝的社会财富的来源，问题是天下农民皆力耕勤织，为何松江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能比其他府州特别是北方地区多得多呢？

日本研究明清经济史的有关专家认为，明清时期，松江府的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作物的栽培技术有重大进步，使作物产量（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提高。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上，日本学者滨岛敦俊指出，明代中叶以前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表现为“外延式开发”，即建造规模较大的圩田，圩田中间还有河渠、池塘和不少的荒地。在“外延式开发”初步完成之后，即逐步进行“内涵式开发”，消除“内部边疆”，实行干田化，一方面把一个个大圩分成众多小圩，由此不仅可以充分开发利用大圩内尚存的一些荒地，而且能够有效地排出农田积水，使之干燥化。这对于松江西部淀泖低湿地带的农田而言特别重要，这里是江南最为低洼的地区之一，水灾频繁。如果稻田长期积水，对土壤有着极为不良的影响，会严重削弱土地的生产能力。同时，排出农田积水，使之干燥化，不仅有利于水稻种植，提高其产量，更能够在上面种植冬季旱地作物。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改良，使得同一块耕地上的水旱轮作成为可能。

据日本学者北田英人研究，明代中叶以前，江南地区大片农田被淹是常有的事，此后经过干田化改造，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7〕

也正是有了这种改良，才有了“春花”作物的大规模种植，由此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复种指数。据滨岛敦俊等人的研究，“内涵式开发”的过程开始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期方告基本完成。这就意味着，明清时期，松江的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越来越高。充分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的第二个表现是人们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灌溉条件和肥力状况，逐步在高阜地区不大适宜种植水稻的耕地上种植适宜生长的棉花等经济作物。按照何良俊的说法，在松江东乡高阜地带，如果种植水稻的话，一夫一妇每年只能耕种5亩，丰年每亩才能产米1.5石。〔1〕但如果种植棉花的话——实际上后来在宜棉耕地上普遍种上了棉花。据考证，明末清初，平均每亩可收籽棉80斤，价值超过了丰年水稻收益。〔8〕

到了清代中叶以后，棉花的亩产量还有所提高，包世臣说，18世纪末的棉田，“盛者亩收于花二石”，据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称：“一亩之入有百斤者为满担倍者是年之极丰者，不恒有。”棉花的大量种植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利于其生活的改善。从作物栽培技术来看，明清时期也有明显的进步。其中最为重要的技术进步是农田追肥技术的改进。尽管很久以来农民就重视对稻田的施肥，但施肥方式主要是施基肥，即在下种或移栽以前给稻田施肥。追肥技术则出现较晚，这是因为掌握水田适时追肥情况与时间极为复杂，“盖田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力一壅，须相其时候，察其颜色，可为农家最要紧机关。无力之家，既苦少壅薄收；粪多之家，每患过肥谷秕。”〔9〕

因此一直难以为农民所普遍掌握，甚至连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没有提到稻田追肥的问题，但到了清代，这一技术得到普及，而且一般要追肥两次。据记载：松江地区“肥田者俗谓膏壅，上农用三通。头通红花草也，然非上等高田，不能撒草，草子亦亩须四五升。二通膏壅，多用猪粪，亩须十担，三通用豆饼，亩须四五十斛。若农贫，只赍豆饼壅田。”①这就是说，农民用红花草作为基肥，第一次追肥用的是“猪粪”——即猪栏中经猪践踏过并泡进了大量粪便的稻草或其他干草，肥力极强；第二次追肥用的是豆饼，即大豆榨油后的副产品。应当说，在大规模地使用化肥之前，这种施肥和追肥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实际上，就保持土壤的肥力而言，这些肥料比化肥要好得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豆饼作为肥料是在明代中期才出现的，上海地区使用豆饼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卷35《木棉》，他把豆饼与粪、灰和生泥并列，作为最重要的肥料。到清代即大规模使用，由此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产量和产值，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精耕细作的程度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而这又与一些新农具的推广使用密切相关，如铁搭、耕荡等农具的推广使用。虽然这些农具出现于元代，但上海地区的普遍应用则是在明清时期。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以铁搭代替牛耕是一种技术上的倒退，因为它的功效远低于牛耕。它的普遍应用被认为是人口压力的产物——有了过剩的劳动力自然就不要牛耕了。但如今人们认识到，铁搭是一种非常适合于土壤粘重的水田农作的高效率农具。而土壤粘重正是淀泖低湿地区水田的特点。在土壤粘重的水田上，一般牛耕既浅而又不匀，用铁搭，虽然功效较低，但可以翻得更深更匀，这对于改善土壤性质，提高其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10〕

在耕作过程中，人们非常注意精耕细作，增加劳动投入和肥料投入，如耕耘除草，已讲究三耘，即在插秧之后进行“三荡”，数日后曰头荡，越十日后曰二荡，又越十余日后曰三荡，以便补苗护苗，清除杂草。这些精耕细作的方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棉纺织技术的改进与推广对手工业的发展亦大有裨益。松江乌泥泾的黄道婆对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元初，松江地区棉纺织工具简陋，技术落后，棉花去籽用手剥，用线弦、竹弧弹松与并条，产量和质量均不高。黄道婆从海南岛带来了先进的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1。

② 顾清：《松江府志》卷2，《水利》。

③ 《明嘉靖实录》卷558。

④ 《兴水利以充国赋疏》，《农政全书》卷14。

⑤ 《请急修水利以预储蓄疏》，《农政全书》卷14。

⑥ 嘉庆《松江府志》卷27，《役法》。

⑦ 《明经世文编》卷22。

⑧ 顾清：《松江府志》卷4，《风俗》。

纺织工具和技术，从轧花纺纱到织布，有一整套工具。到明代，经过松江地区劳动人民不断改进，逐步形成了从种棉、纺纱、织布到制造日用棉纺织品的配套综合生产能力，出现了中国棉纺织手工业发展史上的飞跃。

为什么先进的棉纺织生产技术在崖州并未能使那里的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传到松江后却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如此重大影响呢？为什么同样精美的棉织品在崖州不过是一种生活上的艺术品，在松江就转变成成为大可盈利的畅销商品，成为最有发展前途的手工业呢？这是因为两地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在松江，社会经济的发展，已把棉纺织生产工具的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自宋代以来，这里已经是全国经济文化很发达的地区，而且地狭人稠，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这里的内陆水陆交通遍及全国，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已走出了自给自足的范围，投入市场的商品比重日益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很重，单靠农业生产不足以交纳赋税和维持生存。

再从生产技术发展角度看，黄道婆之前，异常落后的棉纺织技术当然谈不上能以较少的劳动力获得较多的劳动成果，棉纺织工具的改进，使种棉、纺纱、织布变得有利可图，甚至赶上和超过了粮食生产的获利，必然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一行业。犹如种子，在崖州尚未形成破土而出的客观条件，一旦落在松江肥沃的“土壤”上，就能萌发出具有巨大影响的生产力，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松江家庭棉纺织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农家妇女、儿童大部分投入这种生产活动，增加了农民的家庭收入。

众所周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水乡泽国的苏松地区来说，这里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水的控制和利用。叶梦珠说：“松郡滨海带江，渔盐灌溉，民命寄于水利。”^①顾清《松江府志》言，“府境诸水，亦自杭天目及苏之太湖而来，淳浸萦回，由松江、黄浦而会归于海，土之沃以是，而害亦以是”，^②《明实录》也曰：“苏松地方延袤千里，财赋所入为天下三分之一，由外滨大海，内阻江湖，大河环列于郡县，以吐纳江海之流；支河错综于原野，以分析大河之派，寸土尺地皆获灌溉，此东南财赋之源也。”^③

因此，历代统治者对江南水利的兴修都十分重视。对于松江的水利工程而言，其要有三：一要防止海潮浸蚀，壅塞；二要防江湖泛滥；三要治沟恤灌溉。明代在松江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兴修，颇有成效。永乐年间，朱棣命户部尚书夏原吉治苏松水患，为明代江南海运和水利奠定了基础。终永乐之世，苏、松地区各县筑堤、疏渠、治堰，不曾中断。正统六年（1441年），巡抚周忱采用杜宗桓建议，修吴淞江。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年间，又屡有兴修，到嘉靖时，又因年久失修，常年为患。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以吴淞淤塞，浚地长一万四千三百余丈，以赈代工，颇见成效。如果说，明政府在治理黄河，疏浚漕运水道上，曾花费不少人力和金钱，然成效甚微。

相比之下，对太湖流域水利的兴修，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果。吴岩说：“窃以为国家财赋多出于东南，而东南财赋皆资于水利，是故禹之治水也，以四海为壑，而尽力于沟恤。宋元以来，诸儒以开江治闸治田为东南第一义，有由然也。”^④反观北方，如徐贞明言：“西北之地，夙号沃壤，皆可耕而食也，惟水利不修，则旱潦无备；旱潦无备，则田里日荒，遂使千里沃壤，莽然弥望，徒枵腹以待江南，非策之全也。”^⑤

殷周时的黄河中下游，秦汉时的关中地区，到宋元以后，随着水利失修，水土平衡失调，日益衰落。南北贫富之别，与兴修水利与否，关系如此之大。可见，松江府的经济，在明代之所以能占有突出地位，与松江府不断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紧密相连。在封建经济发展的影响下，赋役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在松江推行一条鞭法，“于是均徭、

① 弘治《太仓州志》卷1，《沿革》。

② 嘉靖《上海县志》卷8。

③ 嘉靖《上海县志》卷1。

④ 陆深：《俨山文集》卷22，《江东竹枝词四首》。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8。

里甲与两税为一。凡一县丁粮毕输于官，官为金募，以充一岁之役。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⑥一条鞭法的推行，反映了明王朝通过赋役制度实现的人身控制已趋于松懈，这对调动松江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无疑起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封建时代，生产力的解放，归根结蒂是人的解放。明代松江府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与人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当地农民已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成为与发达的商品经济有密切联系的农业劳动者。他们中有完全丧失或抛弃土地的独立手工业者，有长期或短期受雇的织工，有以契约关系受雇于经营地主的雇工人，有活跃在城镇的市民游食者。

黄册中登记的户籍，已不能作为这一地区户口的凭证。所谓“人如飞鸟”，封建生产关系在这一地区，已不能像明初那样紧紧束缚他们了。周忱对苏、松脱籍逃民经过深入调查，得出他们有数种去路的结论。他在《与行在户部诸公书》中说：“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苏松人匠，丛聚两京，乡里之逃避粮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创造房居，或开张铺店，冒作义男女婿，代与领牌上工”。“苏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处，屠沽贩卖，莫不能之。”⑦

当然，也有不少人不仅失去土地，也失去人身自由，成为官绅的奴仆或荫户，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仍从事农业生产。后来苏、松的奴变，就以这些人为基础。至于还能苟延残喘留在户籍上的自耕农，也多以纺织收入来支付赋税和官差，他们日以继夜拼死拼活地劳动，在风雨飘摇中挣扎。顾清言：“农家最勤，习以为常，至有终岁之劳，无一朝之余，……妇女纺织外，耕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故视他郡，虽劳苦倍之，而男女皆能自立。”⑧这里透露出一条重要信息，即松江妇女和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经济地位决定其社会地位，松江妇女的独立自主权为北方妇女所望尘莫及。

据统计，松江户口的人数在不断地递减，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有户249,950，口1219,939，平均每户4.88人。到万历六年（1578年）户降为218,359，口降为484,414，平均每户2.22人，且不说承平二百年户口应有较大增加，即不增不减，这百分之六十的人口，跑到哪里去了呢？奥妙就在于松江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正在解体。在生产关系的变动中，已可看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曙光！

四、上海港的开辟与上海的繁荣

松江府之所以兴盛，除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外，还与它所处的特定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松江府地处我国南北海岸线中心，是长江的门户。客观上的有利条件，使松江地区的海上交通历来就很发达。到了明代，吴淞江和黄浦江合流工程的成功，就把内河运输和海上交通完全联结起来，从此海舶进出自如，这就为上海这座新兴大城市的崛起，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江浦合流，黄浦江成为太湖下游的重要泄水道及上海港兴起的格局，都是在明代奠定的。唐宋以来，江南地区的出海口，曾几经变迁。早期，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是青龙镇，正如何良俊所说：“青龙自唐宋以来为东南重镇也，相传有亭桥六座，亦通海舶，由白鹤江导吴淞入海。宋时设水监于此，盖以治水利兼领海舶也。”可惜兴旺一时的青龙镇，宋代后因下游淤塞，已变为沙涂，“入我朝来，水道湮塞，而此地遂为斥卤矣”。[1]

青龙镇没落后，太仓浏河口取代青龙镇成为江南海运的主要港口，在朱清、张瑄的经营下，浏河镇“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码头。”①

太仓也因海运之利，成为商业重镇。从南宋末到元代，随着青龙镇的衰落和海岸线的延伸。上海镇逐渐兴起，海运事业一度颇为发达，然而到元代后期，吴淞江淤积速度加快，上海镇也因泥沙湮塞，使海舶进出不便。因此，上海港口的兴衰，关键是解决吴淞江下游出海口的泥沙淤塞问题。上海港的再度兴起，转折点是在明永乐二年（1404年），对这个转折点起决定作用的，是吴淞江与黄浦江合流及下流河道的疏通。宋元两代为解决吴淞江下流淤塞，花了不少人力与物力，但始终未找到理想的解决途径，正如夏原吉所说：“前代屡疏导之，然当潮汐之冲，淤泥淤积，屡浚屡塞，不能经久。”②

在吴淞江淤塞的同时，元泰定四年，黄浦江下游也渐渐变狭，经常淤塞。明永乐二年，夏原吉接受叶宗行建议，一方面引

吴淞江入刘家河，同时又着重疏浚黄浦江，“于上海浚范家浜接黄浦达海”，开始了江浦合流。黄浦江下游出海口，从原来高桥一带东虬江移至正北的大跑浦。两江合流水源充足，冲刷泥沙不易淤积，使上海港免蹈青龙镇的复辙。到明中叶，黄浦江的地位已超过吴淞江，“黄浦自永乐疏凿以来，凌驾东南，不特可与江并称而且过之。或以浦夺江，权为词，呜呼，陵谷变迁，固有数存焉，而又安知其来者何如耶？”^③

明嘉靖《上海县志》的作者，虽为江浦合流的巨大变化不胜感叹，进而认为将来的变化未可预卜，但对上海最后会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甚至经济的中心，成为世界著名的大都市，恐怕也始料未及。

江浦合流，不但畅通了泄水道，有利于农田水利建设，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交通和航运事业的发展。在现代化交通工具出现之前，水上运输在促进全国各地经济联系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明中叶后松江地区以上海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内河航运、长江航运，及沿海的北洋、南洋航运和国际航运等五条航线，使上海“襟江带海”的自然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太湖流域水网交叉，四通八达，黄浦江和吴淞江上下畅通，成为松江府与太湖流域之间的主要航线，这就使上海与太湖流域、杭嘉湖平原这两大经济区域联系更为密切。明、清两代，从吴淞口可以出海。

永乐十年（1412年）在海舶往来最为冲要的吴淞口入海处岸边，筑起方广百丈，高三十余丈的烽墩土山，名曰：“宝山”，“昼则举烟，夜则明火”，以利航行。郑和下西洋第三次出航，即从这里出发，许多私商海舶也利用这个“宝山”指标进出海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上海以棉、布贸易为基础的航运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上海名士陆深描写当时上海的内河航运：“黄浦湾之东转头，吴淞江下碧如油，不用并州剪刀快，水晶帘下上西楼，滨口航船一字帮，棹歌和起自成腔，潮来上南潮落北，南到湖南北到江。”^④

到嘉庆、道光时，上海已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据记载，当时的土布“松、太所产，卒为天下甲，而吾沪所产，又甲于松、太。山梯海航，贸易南北。……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11] 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沙船总数已达三千五、六百艘，总共雇佣“在船水手十余万人”，^⑤上海逐渐发展成为“舟车辏集”的商业城市。

上海港的开辟，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上海都市的兴起，关系十分重大。明代，全国各地的商人，用船舶运来各地土特产，到上海等地后，再收购棉布或棉织品。由于明代北方田赋轻，棉花的成本比松江低；松江赋重，棉花成本高，棉花不够供应，故多用北棉。吴伟业在《木棉吟并序》中赞曰：“昔年河北载花去，今也栽花遍齐豫，北苍高花渡江南，南人种植知何利。”徐光启说：“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①

这样，松江的棉纺织品远销北方，而松江所需的棉花又靠北方供给，形成南北交流。松江用棉布从东北换来大豆、人参、皮货等特产，从东南沿海和海外换来南方土产、香料、珍珠，特别是源源不绝的白银。各地“富商巨贾操重货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②这些白银流入市场，成为主要的货币，又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达。“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每晨至午小东门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焉”。^③在鸦片战争前，上海已成了南北棉花、棉纺织品的交易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都市的兴起，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比松江府本身的发展要大得多。

在古代上海地区的发展史上，松江府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春秋战国时，这一带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到汉代依然是水乡泽国。隋唐以来随着中原人民大批南迁，发展速度加快。唐代只设立华亭县，元代设置松江府，并建上海县。到明代，松江地区已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区域。上海也从一个普通的县邑，成为“东南名邑”。弘治《上海县志》称“列圣深仁厚泽，培植百余年来，人物之盛财富之多，盖可当江北数郡，蔚然为江南名邑矣。”从嘉靖《上海县志》中看到的《上海县市图》中，县城已有南北、东西走向，整齐交叉的街道，三牌楼街、四牌楼街及新街巷等十条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筑了城墙，政治地位更显重要，明代上海城市已初具规模。明代松江府的发展，为上海都市的兴起，创造了物质基础。

明代松江府，或范围更大一些的南直隶各府州，明清两代经济的发展始终居于全国最前列。从丝绸、棉布的发达；从可能转化成产业后备军的过剩劳动力；从通往全国的水陆交通、对世界各国的通商贸易；从上海港口得天独厚的有利形势等诸方面来看，上海已完全具备了成为近代工商业城市的一切条件，可以发展为东方的曼彻斯特。在这里，最先透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曙光，看到了古老中国发展的希望。但明代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败坏了这份家业。

明中叶后，正当松江地区开始欣欣向荣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逐渐东来，并实行海盗式的掠夺，特别是嘉靖时的“倭患”，使松江地区蒙受严重的损失。明代统治者对于海外贸易极不重视，基本上实行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也影响了上海的发展。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战火不绝。本来，松江府“松民货利，半仰给纺织”，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以及清兵入关等连年的战争使南北阻隔，布商不至，棉花价格大幅下跌，百斤一担，值银不过五、六钱。商品经济萎缩，对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的打击是巨大的。天灾与人祸并降，水灾、风灾、旱灾频至。

万历时，江浙一带丰年米价每石五钱，到天启时每石至一两五钱。崇祯十四年大旱，上海县城内百姓饿死者，“上海六门，日出数百尸，此城中死者，余所目见，不知村野之间又几何也”。[12]

甲申之变后，清兵大举南下，松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三屠以及松江、江阴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扼杀了。松江地区在明代兴盛衰落、历尽沧桑的命运，始终同古老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明中叶松江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上海的繁荣，随着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和战争破坏而夭折，那么康雍乾时期这一地区再度出现的繁华景象则为此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所摧残。鸦片战争后，上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随着上海开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日益深入上海地区诸县城，洋货排挤土货，机制工业品代替手工业品，上海地区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特征是，上海地区中世纪的手工业及城镇的衰落，一个以租界形式出现的近代大都市正在逐步崛起。租界具有两重性，它既是民族的耻辱，又是文明的橱窗。上海租界市政设施和交通工具的近代化，市政管理的专门化和法制化，自来水、煤气、电灯的使用，公园的兴建，华美的建筑，典雅的住宅，十里洋场的繁华，市民的娱乐场所，文明遐迩的文化设施等等，展示了西方文明的光彩，加速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步伐。上海，最终成了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经济贸易中心，它的社会经济也逐步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参 考 文 献]

[1]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 卷14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 何泉达. 明代松江地区棉产研究 [J]. 中国史研究, 1993, (4).

[3] 范金民. 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1-13.

[4] 严中平. 中国棉业之发展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3: 19.

①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木棉》。

② 叶梦珠:《阅世编》卷7。

③ 诸华:《木棉谱》。

[5]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835.

[6]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 卷16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7] (日) 北田英人. 宋元明清中国江南三角洲農業の進化と農村手工業に関する発展研究 [M] // 1986—1987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 1988.

[8] 李伯重. 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 [J]. 农业考古, 1985, (2).

[9] 崇祯. 沈氏农书 [M] // 陈恒力. 补农书校释.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3.

[10] 游修龄. 中国稻作史 [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95. 李伯重. 多角度看江南经济史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21—96.

[11] 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 [M] //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45.

[12] 清代日记汇抄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162.